

《学记》的教育心理思想研究

常校珍

《学记》是《礼记》的四十九篇之一。历来都被视为我国教育史上时间最早、论点最多、内容最全的一本教育理论专著。但其中的教育心理思想，历来却很少有人作系统的研究，本文不揣鄙陋，略陈俗见，以请教于同行诸公。

一、学生的学习心理

关于学生在学习知识时应遵循的规律和应具备的条件，《学记》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很多有益的见解：

(一)“学与五官”的关系是辩证的，必须灵活掌握。它说：“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学记》所说的“五官”，即耳、目、口、鼻、心，和我们所说的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唯思维器官而已：昔言心，今言脑。而这里所说的获取知识要靠五官但不等五官；而五官不经过训练，也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观点，既是客观事实，又是辩证的道理。《学记》作者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为了进一步证明“学与五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当时就能运用“比物醜类”的逻辑，引用“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的事实，论证“学与五官”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因果和互相促进的。因而他明确地指出，知识首先是从具体的事物感知而来的，但又必须同时运用自己的思维，即用同类的事物相比，因理推论

以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如他所列举的“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以证实“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的事实；“玉不琢，不成器”以证实“人不学，不知道”的事实；“蛾子时术之”以证实学习“小成”之后才能“大成”的事实和“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的事实，等等，都说明教师教学生必须从学生的心理特点出发，先具体后抽象，先已知后未知；同时要把二者的内在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和推理，得出正确的概念。换言之，《学记》认为，学生要获得“真知”，就必须在感知的基础上及时运用思维，只有这样，才能推断出新的结论而获得新的知识。所以说，明确地认识“学与五官”的辩证关系，正确地掌握这种心理过程，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极为重要的心理条件。

(二)人的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是通过学习实践活动实现的。所以掌握知识的活动过程，也就是发展智能、思维和思想的过程，就象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讲的：“所有学习都是联系的形成；而联系的形成就是思想、思维、知识”。也就是说，人只有凭借神经通路的作用，才能使感官与思维建立紧密联系而协同动作得以储备知识。这些，当然是《学记》作者由于时代的局限无法讲清的心理和生理的道理。但它却能综合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的辩证观点，

墨子“循所闻而得其意”是靠“心之察”（《经说》）的科学道理，以及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尽心》）和荀子“入乎耳，著乎心”（《劝学》）的正确思想，不仅认识到思维在认识客观事物、储存知识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从实际出发，独辟蹊径，提出了培养和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特殊见地。他说：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记》作者在这里自始至终申述“喻”在教学中的特殊作用，而且以能否用“喻”（“君子之教，喻也”）和“博喻”（“能博然后能为师”）作为“为师”的起码条件，都是从教育心理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学生虽然年龄不一，“心之莫同”，但其形象思维都是共同的——尽管先后不一，程度不同，却都是以它为基础而开展各种思维活动的。所以《学记》强调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用“喻”，强调“善教”必须“善喻”，就因为“喻”具有鲜明生动的特点，符合学生的心理要求，最容易引动学生进行积极思维，并能提高教学效果。这也就是《学记》作者所以提出要加强培养学生思维习惯的原因所在。那么究竟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如前所引，它实际上提出了三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兹分别析述于后：

1. “道而弗牵”。这句话的今意是，对学生施教，只能引导他们自奋自进，不能强拉硬扯，这里的“道”就是“导”。至于如何具体引导，《学记》作者授予“师者”的锦囊妙计，首先就是“听语”。所谓“听语”，王夫之的解释是：“听其所问之语而因量以善诱之也。”其意是说，教师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要忙于回答，要视其接受能力，因

人而异，运用相宜的方法诱导他们自己思考，解决疑难。其次是“力不能问，然后语之”。即在教师“引而不发”（《孟子·尽心》），学生百思不得其解，“譬如宝在玄室，有所求而不见”（徐干《中论》）的焦急时刻，教师再进行“约而要”的直讲。再次是“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意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经常加以检查，并观察他们的言行，但不立即告以原理，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自己用心思考的习惯。这是《学记》作者对于孔子“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的教学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他主张教师要“时观”学生，但不能也不应该对学生时时叮咛告语，要等到学生对问题有了必须知其所以然的自觉要求的时候，教师再去解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就会全神贯注听讲，效果自然会好。由此足证，“道而弗牵”是培养学生思维习惯，提高思维能力的好方法。好就好在“道”（导），而不在“牵”，师生为了解决一个难题，双方共处于积极的和紧张的思维状态，“然后尽其声”而“相悦以解”，亦即“道而弗牵则和”，即使教者更乐于教，学者更乐于学。

2. “强而弗抑”。这是《学记》所包容的更为宝贵的教育心理思想。从“强”和“抑”的含义中可以看出，所谓“强”，据焦循注：“勉也”，意即“策勉”。王夫之又解：“强，刚也”，“谓刚正以之也”。由此可知，“强”非为“勉强”，更非“强迫”，而其原意是激发和鼓励。所谓“抑”，郑玄注：“犹推也”，意即推动。既无压制之意更无惩罚之心，而是积极地鼓励与推动。所谓“强而弗抑”，就是教师策勉学生自觉上进而不是逼迫向前。换句话说，学生内在的觉悟只能启迪，信心只能激励，热情只能鼓动。因为被动式的学习，是不会使学生开动

脑筋的。《学记》作者坚持“强而弗抑”的思维培养法，说明它摸透了被教育者的复杂心理。同时实践也证明“强而弗抑则易”，就是说建立在自觉的积极思维基础上的学习是比较容易进行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3. “开而弗达”。这里所说的“开”和“达”，据王夫之解释：“开者，启其端；达者，尽其悦。”（《船山遗书·礼记章句》）通俗地讲，“开”就是开启或启发；“达”就是通达或透彻。所谓“开而弗达”，意即教师对学生的提问，只能启发，诱使他“开动机器”，自己思考，自决疑难，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更不能代替学生作答案。一个“善教者”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无论是学生的问难，还是向学生释疑，都是“开而弗达”，从不越俎代庖。因为他深深懂得：一个人的渊博知识，是用自己一点一滴的汗水汇成的，别人无法代劳；一个人在学术上的精辟见解，更是自己独出心裁的，别人难以出力。所以，他的施教，常常是给学生以恰如其分的启示和适可而止的开导，帮助他打开思路，从不为图省事把“谜底”直告了之。因此，《学记》认为，“师者”为了有效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就只能耐心细致地为之“开”，决不能草率从事地为之“达”。

（三）意志问题，是教育心理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教育家孔子开始就很重视意志教育。他首先要求学生要立志：“志于学”，“志于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同时要求学生要坚持不懈：“学而不已，闾棺乃止”（《韩诗外传》）。这不但使他自己成了“至圣先师”，而且还为社会培养了七十二贤。墨子也主张“志不强者

智不达”（《修身》）。《学记》的作者总结了这些历史经验，得出了“士先志”的结论，要求凡欲读书成才者，必先立志。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但从理论上强调为学立志的重要，而且从具体的学习实际出发，在学制上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年视离经辨志”。所谓“辨志”，据郑玄解释是“谓别其志意所趋向也”（《礼记注》），意即考查学生能否辨别自己的志愿和决定学习的趋向。这和现代心理学上讲的“意志”概念——“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活动”的解释，虽不能说是完全相同，也可以说是大体相似。特别是从《学记》首先要求教师在学生入学的头一年通过“离经”，即分析经义章句的同时进行“辨志”，从中观察学生的行动是不是根据他的学习目的，并受目的的支配，自觉地和有趋地学习“经义”这一心理过程来看，教育心理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不但如此，《学记》作者还曾指出，不管学生有无一定的志向和意志行动，教师都应根据“辨志”的结果以“游其志”，意即想方设法教育学生养成从容的学习习惯和浓厚的学习兴趣。他还认为如果能在入学的第一年奠定这个基础，学生以后不但能够“志学”、“乐学”，而且还能“强立而不反”。就是说，他们自己因此而能养成坚强独立的意志，不再游移不定了。与此同时不仅不会出现违反教师教导的事，而且还会“继其志”，更加乐于跟着老师学习以达到教师所期望的目的。

至于如何具体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学记》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如前所举，它引述“蚍子时术之”，即蚍蜉之子虽是小虫，但它能时时不息地效法衔土而成“大垤”的道理，以晓喻求学者应学蚍

蟬之子的所为，夜以继日不倦地学习，从“比年入学”之日起坚持七年就能达到“小成”；继续坚持到“九年知类旁通”实现“大成”之后，就可学到“感化群众，变易风俗”的本领。“建国君民”的远大理想，即可如愿以偿。在《学记》中类似教育学生持之以恒，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以期学有所成的例证还很多，都是应当肯定的。

（四）学习上有个别差异，教师要因材施教。《学记》里有一段阐述个别差异的话：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

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学生类型不同，大体可分为四种，即“多”、“寡”、“易”、“止”四种不同心理特点。这些特点不是人为的，《学记》作者说，是“心之莫同”自然形成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又各有其具体的和特殊的反映。

“或失则多”的学生的心理常常表现为贪多务得。特别是资质较差的学生，如果这样，则很可能象猴子掰包谷，所获无几。

“或失则寡”的学生，是由于他的天资聪慧，但喜欢“单打一”，往往抓住一点钻“牛角尖”，久而久之，就使得知识面很狭窄。

“或失则易”的“易”，王夫之的解释是“果而不知难”（《礼记章句》）。认为这类学生有一种轻率心理，他们没有深入思考的好习惯，只满足于“浅尝”而“见异思迁，此事未尽，又为彼事也”。（俞樾《群经评议》）。

“或失则止”的学生是没有顽强的意志，这类学生畏难苟安，或作或辍，甚至

在功匮一篲时，他也会半途而废的。

二是教师必须“知其心”，从学生的“莫同之心”中了解其所以“失”的原因以“救其失”。也就是说，只有教师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掌握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长善而救失”。

如上所述，“多寡易止，虽各有失”（王夫之《礼记章句》），但不是没有优点可寻的。事实证明，“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同上）教师只要能够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学生，每个学生都有优点和缺点。失之于多的学生“便于博”，教师可以抓住他“渊博”的优点以取长补短——克服学习不深不专的短处，力求使他能够深而广，专而博。失之于寡的学生“易以专”，教师要抓住他喜欢专一，好求甚解的优点使他向广阔的方面发展。失之于易的学生“勇于行”，教师要抓住他勇于进取的优点，克服其轻率肤浅的缺点，使他正确对待学习中的难、易问题，稳步前进。失之于止的学生“安其序”，教师要抓住他“盈科而后进”的优点，克服急躁情绪和遇难而退的缺点，教育他不怕困难，勇于前进。据此，《学记》又特别提出：“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意为教师只要知道学生的程度有深浅，资质有好坏的不同，就能多方诱导。这种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包括智力、能力和学习态度等各方面存在的不同情况进行因材施教的思想，在《学记》成书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学记》对学生学习心理探求的范围很广，除上述者外，还特别注意学习兴趣的培养，所谓“退息必有居学”，亦即今之所谓“第二课堂”，这是《学记》作者早就注意而且具体实施过的。他说：课外“学操缦”，课内“能安弦”；课外“学博

依”，课内“能安诗”；课外“学杂服”，课内“能安礼”。他用上述三事证明课内外学习结合，效果显著的同时，又肯定地认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就是说，如果不引导他们学习课外的这些技艺，就无法补助正常课业的不足而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这种道理，就是今天来看，也是很正确的。

二、教师的教学心理

《学记》中关于教师心理的知识和思想，不但很丰富，而且具有创见性。所谓“教学相长”，“学学半”，把教与学的心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说明教师的心理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学是教的基础，教是学的延续；只有学好才能教好。因此，既教又学，教到老学到老，这是教师独具的而且是始终如一的心理活动，也是特有的心理品质。但又不可否认，教师毕竟是以教为主的，他要教好，除储备广博的知识，还应具流畅的口头表述能力，高超的教学艺术以及崇高的思想、道德情操等各种心理因素。《学记》的中心思想正是如此。所谓“名学记者，以其记人教学之义”（郑玄《礼记注》）。从这个意义说，《学记》，又毋宁说是“教学笔记”。因为它通过教学活动的记述，具体地反映了教师的各种心理品质：

（一）“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师。”《学记》上这句话的特点在于：从实际出发，具体地提出了只有掌握教学原则和方法，摸清古今教育成败和学生“尊师敬学”或“疾师辍学”的原因所在，才有可能、有办法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教师。对于这个问题，《学记》讲了很多道理，而且都是针对当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不同的教师所具备的不同教育心理导致的不同教学效果

有感而发的。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能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上引“兴”和“废”的内容的原意，究竟何在，过去的训诂家“纷纭聚讼，莫决从违”。现就我自己的理解，析述于次：

1. 为什么说“禁于未发”教则“兴”；“发然后禁”教则“废”？《学记》作者虽然没有论证，它却是对于无数具体事实的总结和概括。凡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少成若天性”（王充《论衡》）。孩子好比一张白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好坏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比如练习写字，一开始就要从严要求：姿势，必须是头正、身直、臂开、足安；执笔，一定要做到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腕肘悬起；运笔，要注意起、收、提、顿、轻、重、转、折、方、圆、藏、露等等，决不许随心所欲。否则，养成坏习惯，就很难改正。“禁于未发”比之“发然后禁”要省事得多。因此要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2. 为什么说“当其可之谓时”？孙希旦为“时”作注说：“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时之谓也”（《礼记集解》）。这是求学者的最佳年龄阶段，所以《学记》作者认为，“当其可之”的适时教育比之“时过然后学”——记忆力有限甚至衰退时再去学习是既多快而又好省的。还因为“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散而易失”（《抱朴子·勖学》）。《学记》这种按照学生的相当年龄和适当时机进行教育的观点，至今也是非常正确的。

3. 以“不凌节而施”与“杂施”相比较,《学记》认为前者“谓之孙(顺)”。其原因是教师能够根据学生“年有长幼,学有深浅”(《朱子文集·礼一》)的实际,“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钝者以大”(郑康成《礼记注》)。顺乎自然规律进行教学效果好。它把后者即“杂施”,谓之“不孙”的原因,认为是杂乱无章,不遵循一定的顺序,强人所不能,其结果必然是“坏乱而不修”。

4. “相观而善”与“独学无友”的利弊是不言而喻的。后者所造成的恶果是使学者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前者不然,它能使大家通过相互观摩,“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取长补短,得到长足的进步。

除上述四种相互关系之外,对学生自己来说,导致他们学习失败还有自身的原因,即《学记》指出的“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三朋四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论语》),自然要“逆其师”,“废其学”。为师者应该对此有足够的重视,对学生的“交友”,也应予以指导,使他们交“益友”不交“损友”。

(二)“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学记》这样提出问题,并非使教师得到一时的精神安慰,而是在着重说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以为终身最大的乐事。如果他的学生也因此而“继其志”,更是莫大的安慰,这是一。第二,《学记》作者要人“继其志”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教师达到“善教”的水平。为此,《学记》作者独具匠心地用“善教者使人继其声”作喻,其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能使人继其声的“歌者”,是用他的艰苦劳动甚至毕生的精力才换得的高超歌技,才使人由倾心仰慕而争相“继其

声”——跟着学唱,欲罢不能。“善教者”要人“继其志”也是这样,要付出毕生的心血。为此,《学记》作者提出了“使人继其志”的“善教者”,应该具备如下的特殊条件,亦即独特的能力:

1. 教学语言要达到“约而达”的水准。所谓“约而达”,按照吕东莱的解释:“教者之言甚约,然本末贯彻,未尝不达”(《东莱博议》)。这种要求,既需要教师高度的概括能力,又需要言简意赅的表达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博学”,因为事实证明:“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只有教师“博我以文”(《论语》),才有条件、有可能对学生进行深入浅出,明白通畅的讲述。

2. 教师的讲解能力,要能达到“微而臧”的高度。“微”是小或精细,“臧”是善。所谓“微而臧”,是说教师的讲课,虽言细小和浅显之事,却含有美妙深奥之理。就是吕东莱说的:“教者之言甚微,然渊深粹美,其味无穷”(同上)。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如要达到这种高度,除了“积学”的能力,还应具有灵活使用教材的能力,十分恰当地选择教学方法的能力和正确运用语言艺术的能力。只有具备这全部的教学才能,方可达到“微而臧”的目的。

3. 要有“罕譬而喻”的本领。所谓“罕譬而喻”,是说教师虽然用喻很少,却能使人易于通晓。关于这个问题,《学记》本身的举例用喻,是耐人寻味的。如它在说明必须重视教与学的一套大道理时,只用了“玉不琢,不成器”六个字作喻,显示了它的“个性”。这种根据学生形象思维较强的心理特点所采用的“例喻教学法”是教育心理学史上的一个创造。

(下转20页)

折，既使他得到了时人的赞扬和同情，更使他认识到了仕途的艰辛和朝政的黑暗腐朽。他在这个时期所产生的《新乐府》诗并序，可以说正是其斗争生活的艺术体现。

元稹贬谪通州以后，对通州地方的风土民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通之地，丛秽卑褊，蒸瘴阴郁，饑为虫蛇，备有辛螫”（《蟲豸诗七首序》），气候恶劣，蛇虫为害。然而更为严重的却是“夺富挠豪，轧穷役疾，弱者遭播，悍者愤拂，饥馑因仍，盗贼仓卒”，由于官吏的侵夺和自然灾害的严重，百姓逃亡，使得“间落焚燔，人民遂空，万不存一”，田野荒芜，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对这种“功不胜农，虚不胜实”的状况，元稹深感忧虑，对人民的痛苦生活深表同情，因此当“元和十三年九月元稹以司马权知州务”（《报三阳神文》）接任通州刺史职权时，“乃劝州人，大课芟莠”，发动并号召当地百姓砍林开荒，发展农业生产，为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增加国家收入做了一些扎扎实实的有益的工作。“今天子斩三叛之明年，通民毕赋，用其闲余，夹津而南，开山三十里，为来年农种张本，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告畚竹山神文》）

虽不无夸张自诩之语，但元稹曾在通州组织当地百姓发展生产却是无疑的事实。故“通州以元稹闻名”（清《达县志》），这是不无道理的。正由于元稹的谪居生活，正由于他对下情的了解和体察，才使得元稹在通州时期写下了《古题乐府》组诗及序，《连昌宫词》以及《虫豸诗》组诗等，而这些诗作及理论都是元稹整个作品中现实意义最强的，也是他整个作品中的精华部分。

综上所述，元稹贬谪通州时期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通州之地的恶劣环境和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仅给元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而且为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的基础和充分的条件。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它既折磨了诗人，同时也成就了诗人。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一员，元稹同其它许多诗人一样，在通州时期也有过颓废情绪和消极思想，这在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同样反映了出来，不过，这与他在同时期中的现实主义诗论和创作实践相比较，毕竟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我们今天指出这一点并引起注意是应当的，但却不应当以此苛求于他。

（上接48页）

总之，《学记》一书，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教育心理学的思想。笔者探其新，并非溢其美，它是一本瑕瑜互见而又瑕不足掩瑜的书。它本身虽然存在着所谓“古之学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和“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等等的问题，那是历史的原因，说阶级局限也可以。然而，研究受教育者在教育影响下形成道德

品质，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整个智慧和个性心理规律，研究教育同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的相互关系以提高效率，这是不分阶级不论古今都是同此一理的。《学记》正是在这些主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可以称之为珍贵的遗产，我们需要尽力挖掘的也正是这些。